

文史资料选辑

1978

第二辑

6

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1978 年第二辑(总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35,000

1979 年 2 月第 1 版 197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书号 11074·393 定价 0.60 元

内 部 发 行

编辑说明

一、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工作总则第十条第四项规定,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为了结合本市特点,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不定期地编印本选辑。

二、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积极推动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所收资料大部分系提供者亲身的活动和见闻,凭记忆所及和依据一定资料追记而成。由于各人条件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仅供内部参考,不宜引用或外传。

三、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大部分是本会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有关单位征集来的,内容包括从戊戌以来各历史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史资料。

四、本选辑所刊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五、本会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

- 上棉二厂厂史选载……………姜沛南编写 (1)
- 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许德良 (53)
- 回忆上海大学……………薛尚实遗著 (63)
- 五卅烈士墓和纪念碑(资料)…………… (73)
- 上海书店——党的早期出版发行机构……………曹予庭 (74)
- 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吴志超 (83)
- 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张汇文 (119)
- 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徐铸成 (145)

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

——上棉二厂厂史选载

姜沛南 编写

编者按：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它的前身是日资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厂史稿，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厂史组与上棉二厂党委宣传组协作的产物，主要依据亲身经历的许多老工人和老干部的回忆，并参照有关革命文献及其他历史资料写成的。这里选载的是厂史第一部分中的四章，叙述五卅运动前夕和五卅运动期间，沪西工人（主要是内外棉纱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些史实。

由历史研究所姜沛南同志修订编写。为供本刊选载，作了部分删节，对原标题也作了一些改动。

一、沪西工友俱乐部

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

我厂老一辈工人，人穷骨头硬，他们不甘心当奴隶，往往用各种办法反抗日本资本家的蛮横欺压，从一九一四年开厂以来，自发的斗争不断发生。特别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我厂工人从六月八日至十二日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

级强大的战斗力和革命坚决性。虽然当时的斗争还缺乏严密的组织,但这种敢于反抗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宝贵的。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我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逐渐懂得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道理,懂得了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向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于是,自发的、分散的斗争发展成为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斗争的意志越来越坚强,斗争的方法越来越灵活,因而能够不避艰险,前仆后继地突破重重障碍,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有了斗争领路人

五四罢工结束之后,日本资本家第一着就是对我们工人进行打击报复。他们费尽心机侦查罢工领导人,胡乱开除一些工人。第二着是整顿统治队伍,责令工头和职员加强对工人的监视和控制。第三着是把内外棉五厂分成东、西两厂。因为五四罢工是从五厂开始的,五厂工人人多势众,难于对付,于是日本资本家在两个工场之间筑起一堵墙,把一个厂变为两个厂,不许工人相互来往,以便分而治之。

工人奋战了一场,仍受资本家的欺压,大家感到很气愤,恨不能立时三刻跳出这无边的苦海。有一个工人名叫黄桂生(现已退休),十三岁那年就跟母亲从湖北家乡来上海谋生,由同乡亲戚介绍进内外棉五厂。他跟随大伙参加了五四罢工和其他一些斗争,可还是找不到出路。大伙儿多么迫切地希望有一个斗争领路人啊!就在这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党的光芒照到了沪西小沙渡,照亮了我厂工人前进的道路。

黄桂生十七岁那年(一九二二年)春天,听到了一件从未有过

的新鲜事，有人在槟榔路(今安远路)锦绣里工房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那时十个工人九个是文盲。黄桂生怀着好奇心，在一个厂礼拜天，约了几个小兄弟一道去锦绣里探望。他们在锦绣里最后第二弄第二家找到了那个学校，只听得里面在热闹地唱京戏。他们站在门口张望着，有一个穿灰布夹袍的老师，中等身材，约莫二十多岁，笑着从屋里走出来，操着湖南口音亲切地招呼他们进去听留声机。黄桂生他们看见已有几个穷哥儿坐在里面，也就走了进去。屋里是一间教室，摆着二十来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桌凳，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就坐下来听戏。

黄桂生还是初次看到留声机，新奇地听了几张唱片。那位老师一面开留声机、一面和大家攀谈。他看到工人有些拘束，又捧出一个足球来，请大家去踢球。正玩得高兴，黄桂生一脚踩在粪污坑里，把球也弄脏了。谁知老师却和气地安慰他不要急，拉着他的手领他到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脚，再把足球洗干净。这件事使黄桂生感动得掉出了眼泪。他不禁想起在厂里弄坏一点东西，日本资本家不仅要照价赔偿，还要把工人打个半死。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回到教室里休息，老师又忙着倒茶倒水，让大家解渴。这时，工人和老师已经打破隔阂，大家亲切地交谈起来。老师说明这个学校是专为帮助工人进步而办的，完全免费，欢迎大家来上学。有的工人提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白天没有工夫读书。老师说，白天没空就晚上来读，如果做夜班，就在下午读；只要大家愿意来，学校里可以多开几个班次。他还鼓励大家说，工人要尊重自己，力求进步，不要因为社会上一般势利眼看不起工人，就灰心丧气，一定要做到人穷志不穷。

原来，党成立后不久，就派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同志，到纱厂工人最集中的小沙渡地区开办补习学校，准备组织沪西纺织工会，领导工人斗争。这位热情的好老师，就是李启汉同志。

启汉同志在教课中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告诉大家，工人世代穷困并不是命不好，而是被万恶的财主吸去了血和汗；工人的敌人既不是机器，也不是个别资本家和工头，而是整个剥削阶级。所以工人要解放，就要联合起来闹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由劳动人民坐江山。启汉同志一再说明，工人与工人是阶级兄弟，是一根苦藤上结出的苦瓜，要不分地区，不分帮派，不分职别，不分男女老少，大家抱义气，结团体，齐心协力和剥削阶级斗争，一面争取改善生活待遇，一面积聚力量准备最后的决战。启汉同志唯恐工人听不懂他的湖南话，他讲得很慢，很有条理；如果工人提出什么问题，他便耐心细致地解释，直到大家弄清楚为止。

可是，黄桂生只读了一个多月书，思想上刚刚开了一点窍，补习学校就被租界巡捕房封了门，连课桌课凳也被没收了。此后启汉同志忙于别的工作，不久就被逮捕（出狱后去广州，一九二七年四月牺牲）。黄桂生十分怀念这位好老师，可是再也没有能够看到他一次，就这样失去了联系。但在十多个同学中，却有一个有心人，那就是同兴纱厂（也是日本厂，在内外棉五厂斜对面）工人孙良惠同志。孙良惠是南京人（满族），从小做工，吃足了资本家的苦头。他听了启汉同志的课，开始懂得工人受穷受苦的根源，积极要求参加革命斗争。他曾按照启汉同志的指示，到浦东日华纱厂联络过工人，还参加过纪念五一节的游行。以后他在厂里反抗压迫被开除，不得已进了一家银行当门警。他已觉悟到，工人阶级只

有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单靠个人反抗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当他和启汉同志的联系被切断后，就到处打听寻找领路人。

一九二二年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了嵇直同志到小沙渡开辟工作。嵇直不了解启汉同志在沪西的工作情况，只得另起炉灶。他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一家木行楼上租下一间房子做住处，通过代写书信等方式结识了几个工人，开办了一个小型的工人补习班。过了几个月，孙良惠就闻风而来，自我介绍他是启汉同志的学生。原来当他焦急地四处打听消息时，忽听人说有一个工人补习班，老师讲的道理和启汉同志所讲的差不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前来寻找嵇直同志。此后，孙良惠经常到补习班听课，在上课讨论时，他总是带头发言，用自己的体会和工人的语言，帮助老师解释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于是被吸收入团，随后又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他是沪西地区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第一个工人，也是党在沪西工人中扎下的第一个根子。

孙良惠做过日本纱厂，又住在同兴工房，平时待人热情，好结交五湖四海的穷朋友，在沪西是人地两熟。这对于开展党的工作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九二四年春，上级组织决定把嵇直同志主办的补习班，和另一个团员徐玮同志（学生出身，一九二七年牺牲）主办的补习班合并成规模大些的工人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上课。根据这个决定，孙良惠在东京路（今昌化路）劳勃生路的转角上租下了一间矮楼房，楼下做教室，楼上做办公室，还有屋前空地可以开展武术活动。当时趁着上海教育界正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机会，便在大门旁公开贴出了“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字条，以吸引工人前来上学。启

汉同志最初在沪西办的工人补习学校被封闭后，后来的同志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又办起了新的补习学校。两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过，党在工人中播下的革命种子，已开始生根发芽，补习学校的基础比以前巩固得多了。经过孙良惠等多方串联，来上学的工人逐渐增加到数十人（两个补习班原来只有十多人）。日班的上夜课，夜班的上日课，流动性也比较小了。经常教课的仍是嵇直和徐玮两同志，孙良惠同志担任辅导工作。有时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同志也抽空前来讲课。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是日本纱厂工人，有内外棉各厂的，也有同兴、日华厂的，我厂工人参加学习的有戴器吉（一九二四年入党，一九二七年一月牺牲）等人。

戴器吉（起甲），又名戴三，出生于苏北阜宁的穷苦农民家中，父亲早死。有一年遇上大水，母亲带了他兄弟三个，摇了一条小船逃荒到上海，哥哥戴二进了内外棉十二厂，他自己进了五厂粗纱间。戴器吉和许多穷兄弟一样，在厂里吃尽日本鬼子和工头的苦，走出厂门还要受流氓欺侮。他受不了这份气，就约了一些同乡小兄弟，天天打拳练武，准备跟日本鬼子、工头和流氓斗。他们看到补习学校门口有单杠、石锁、石担和沙袋等设备，时常到那里去玩。孙良惠劝戴器吉他们说：“你们到学校来读书吧，我们工人光练武还不行，要文武双全，才能斗得过那班坏蛋。”戴器吉一听这话有理，就报名去上学了。那时学校里虽然发给学生识字课本，老师却不一定照本宣讲，主要是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所以常常鼓励学生提出问题，以便联系实际进行讲解。有一次，戴器吉走在路上向一个拆字先生问字，那家伙眼珠一弹，说什么穷工人一辈子别想出头，工字一出头就要入土（就是要死），读书有什么用，……老戴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邓中夏同志来讲课，老戴气呼呼地

提出这个问题来。中夏同志笑着说，那家伙满脑子浆糊，中剥削阶级的毒太深。中夏同志一边笑，一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工”字。他解释说，这个工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这就是我们工人的伟大形象。剥削阶级故意编造一些鬼话，来糟蹋我们工人，其实他们离开了做工的、种田的，一天也活不下去。他接着又讲，我们工人阶级来到人世间，就是给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挖掘坟墓的。别看他们今天耀武扬威，到明天千千万万工人、农民觉醒了，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他们的寿命就不长了，真正要“入土”了，那时的天下就是我们工农的了！中夏同志一番话，说得工人个个精神振奋，戴器吉的一肚子气早已消掉，只觉得自己浑身是劲，似乎一下子长高了许多。此后老戴更加认真地学习，他在补习学校里，不仅学到了文化，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觉悟。经过中夏同志等的细心培养，老戴要求革命的心情愈来愈迫切，不久就参加了党。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些工人如内外棉十五厂的陶静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英勇牺牲）、同兴纱厂的盛松林等，也分别加入了党和团的组织。

就是这样，党在我们沪西工人中的根子越扎越深。而工人一旦有了斗争领路人，也就眼明心亮，勇气百倍地奔上了革命的长途。

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

一九二四年夏天，邓中夏同志等按照毛泽东同志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决定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以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准备斗争。孙良惠、戴器吉、陶静轩等就向工人兄弟积极宣传成立俱乐部的好处。许多工

人表示拥护，大家积极进行筹备。

补习学校的房子太小，容纳不下很多工人活动，组织上决定另找一所比较大些的房子作俱乐部。八月间，孙良惠等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拐角上租得新建平房三间，二间做教室，一间做文娱室，门前空地仍作为武术活动的场地。所需的桌凳和文娱用具等，都由热心的工人从亲友邻居那里借来，或从自己家里拿来。一切布置就绪，就在八月末的一个星期天举行俱乐部成立大会。这天到会的共三十多人。会议由孙良惠主持，上级组织特地派了一位同志到会演讲。会上一致通过了俱乐部章程，并公推孙良惠为主任，嵇直为秘书。会议结束后，有一位同志兴致勃勃地提起笔来，在红纸上写下了十六个大字：“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把它贴在中堂上，这就是大家公认的俱乐部宗旨。嵇直同志还脱下硬边草帽，为俱乐部募捐临时经费，到会的人都尽力捐献。戴器吉等把口袋里的全部家当——几个角子和铜板，统统倒在草帽里。捐款虽然为数不多，但却表现了大家对俱乐部的一片热忱。沪西工友俱乐部就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宣告诞生了。

俱乐部决定开办补习学校、讲演会和各种游艺会，凡是工人都可入学听讲，一律免费，同时征求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做俱乐部的会员。为避免敌人破坏，规定不对外公开会员姓名。

俱乐部成立不久，嵇直同志就调往外地，组织上派刘华（一九二五年底被军阀孙传芳杀害）同志接替了俱乐部秘书的职务，要他和孙良惠等一起负责办好俱乐部。刘华原名刘剑华，四川人，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穷，经亲友介绍来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后来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他在邓中夏同志等的教导下，

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因亲身受过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对于工人的痛苦处境和迫切要求解放的愿望有深切的体会。来到沪西工作后，他下定决心要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俱乐部的地点适中，四周密布着各日本纱厂和工人聚居的工房，加上一些骨干分子的大力宣传，俱乐部的名声很快就在工人中传开了。工人下了班就三三两两往俱乐部跑，三间平房顿时热闹起来。有的下象棋，有的看报纸，有的拉胡琴，门口空场上一伙青年工人们打拳练武，更加活跃。补习学校开课了，来读书的工人很多。因为房子小，虽然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好几个班上课，还是安排不开；接着就开办讲演会，在室外举行，可以多容纳一些听众。有时还举行晚会，演唱一些讽刺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小节目，更受群众的欢迎。

到俱乐部教书和演讲的，有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有一次，恽代英同志来上课。工人都记得他的身材不高，嗓音却十分响亮。他讲的是“劳工神圣”，说：“劳动创造世界，工人阶级最伟大。”他讲机器是工人造的，书是工人印的，布是工人织的，样样离不开工人。工人听了默默点头，觉得老师讲得有道理。在这些听课的工人中，就有我厂的顾正红、季小四子和周高陞等人，他们是由戴器吉等串连来的。顾正红读书认真，听讲用心，风雨无阻，从不迟到。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邓中夏同志讲剥削的一课。那天，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剥削”两个字，教了大家两遍，就问工人道：“你们做一天工，老板给你们多少工钱？”

工人们有的说一角多，有的说二三角，都不懂得为什么要问这个。

中夏同志接着扳起指头替工人算起帐来。他说：“你们做一天工，老板只给你们一二角，但实际上你们创造的财富决不止这一点，不然老板就没有钱赚啦，也不能由一厂开到十几厂（指内外棉）。你们想想，老板一天到晚不做工，就从你们每个人身上拿去很多钱，这叫什么？这就叫剥削。所以，工人兄弟们尽管整天拚死拚活地干，还是不得温饱。”

工人听了好象从梦中醒过来，恍然大悟。他们从此懂得了“剥削”是使工人穷苦的根源。

除了教书和讲演，俱乐部里还教工人唱一些革命歌曲，以激发大家的斗争热情。青年工人最喜欢唱歌，当时就有一首“青工歌”（苏武牧羊调）在他们中间流传，歌词是这样的：

“青工身体未长成，
工资一二角，做工十二点，
做夜工、礼拜工，一刻不休停。
白相都没有，读书没铜钿，
打骂又罚工，开除由他便，
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一概不自由！
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清，
资本家，不做工，专门剥削人，
拿我们当牛马，做工养他们。
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
齐心协力，打倒他们，世界属我们！”

这首歌控诉了广大青工遭受奴役的痛苦，表达了他们的斗争决心，歌词通俗易懂，因此，不仅受到青年工人的欢迎，年纪大些的工人也喜欢唱它。

党就是这样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使革命的真理逐步逐步深入人心。

到俱乐部活动的工人一天天多起来了，刘华同志特别注意培养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经常分批召集他们谈话，进一步启发他们的觉悟。有一个晚上，刘华和工人谈到东洋老板随便开除工人的事。顾正红想起自己被九厂无理开除，失业在家好几个月才进了七厂，不禁怒火直冒，气愤地说：“东洋鬼子不讲理，他们开除工人就象丢掉一块石子那样随便，这口气我现在还不消！”

接着，工人七嘴八舌地诉说起东洋鬼子随便打骂开除的种种苦处。刘华静听了一会，严肃地站起来对大家讲：“我们工人受的苦，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难道我们就让人家欺侮一世吗？”

顾正红立刻回答说：“不，我们要跟东洋人拚个你死我活！”

七厂一个年纪大些的工人接上去说：“正红小兄弟说的对。我原先以为受苦遭难是命中注定，自从听了俱乐部先生讲的许多道理，才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要过好日子，就得跟鬼子拚！”

刘华点点头，进一步提出问题：“你们说要拚，可是怎么个拚法呢？”

五厂青工季小四子激动地说：“你没听说过，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那回因为反对东洋人，我们工人不是闹过大摇班^①吗？那回东洋人对我们还不是干瞪眼。怎么拚，我看就是这个拚法。”

一个老工人担忧地说：“那次大摇班，我们工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有一些兄弟失业了，到头来还是我们吃亏。”

一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季小四子也不知怎样说才好，只是反

① 工人口头语称罢工为摇班。

问了一句：“那我们就乖乖地等死不成？”

刘华斩钉截铁地说：“等死的不是我们，而是资本家！总有一天，他们要被我们埋葬掉！”接着他向大家解释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也不可能一个早上就成功，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要有长期奋斗的打算，要把所有的工人都团结起来，我们团结的力量越大，敌人就越快完蛋。刘华打了个比方说：“我们纺的棉纱，一根根拿在手里，一拉就断，要是拧成一股粗绳，任他大力士也拉不断。我们工人就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又粗又长的绳索。这样就能捆住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手脚，解放我们自己。”

工人凝神静听，不断地点头。刘华就回到大摇班的问题上，说道：“民国八年那回响应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我们工人罢工的功劳很大。但那时工人没有组织团体，所以运动一过就散了，东洋资本家还是欺侮工人。现在可不同了，我们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又组织了俱乐部，还有别处的好经验可以学习，我们再闹大摇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胜利。”

在工人们的要求下，刘华又向大家介绍了安源工人斗争的先进经验。他最后说：“我们眼前的任务，就是要象安源那样，把工人都组织起来，加入俱乐部，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希望你们尽力团结各厂工友，准备斗争！”

在刘华同志的鼓励下，一些积极分子努力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顾正红在七厂布机间十分活跃，每逢夜班做过半夜，东洋领班和工头休息去了，他就领着大家磨洋工，讲大道理。工人都喜欢听他讲俱乐部里的事，他总是把自己懂得的道理，原原本本告诉大家。有时还把刚学会的革命歌曲，轻声教给一些青工小兄弟。他平时待人热诚，好打抱不平，又有一些技术（他是上盘头工），肯帮

助兄弟姐妹做生活，在群众中有威信。因此，许多工人听了他的宣传，都很相信他，相互之间加强了团结。

经过刘华、孙良惠、戴器吉等同志在工人中深入细致的工作，积极分子的队伍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俱乐部成立数月，就从最初的二三十个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个会员，并在这些会员中建立了党和团的组织。而在这些先进工人周围，又以结拜兄弟等方式团结了更多的工人群众，他们在沪西各厂分别组织了许多秘密的工厂小组，总人数将近一千人。象我们内外棉五厂、七厂，就有一二百人加入了工厂小组。党在我们沪西工人中辛勤播下的革命种子，经历了生根发芽的阶段，已经欣欣向荣地成长起来了。

二、二月大罢工

革命的真理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厂（当时为内外棉第五、七、八、十二厂）工人为了反对日本资本家的压迫，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举行大罢工。罢工的烈火迅速蔓延到上海的大部分日本纱厂。数万工人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粉碎了日本资本家破坏罢工的种种阴谋，迫使他们接受了工人提出的一部分条件。

罢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锻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准备了条件。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把二月大罢工称为五卅运动的序幕。